

读《中国出版通史·先秦两汉卷》

徐 棚

(郑州大学出版社 河南郑州 450052)

2008年12月,《中国出版通史》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,全书近400万字,共分九卷,分别是《先秦两汉卷》、《魏晋南北朝卷》、《隋唐五代卷》、《宋辽夏金元卷》、《明代卷》、《清代卷(上)》、《清代卷(下)》、《中华民国卷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卷》。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优秀成果,《中国出版通史》全面阐述古今出版业的兴衰及发展规律,在面世后获得了各界的共同关注,并得到了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。

《中国出版通史·先秦两汉卷》(以下简称《先秦两汉卷》)作为全书的首卷,秉承整套丛书的基本思路、方法、体例,在结构与论述上既显现了和其他几卷相同的特点,又突出了某些独有的方面,值得称道。本卷分十章“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出版活动的萌芽”、“原始编辑出版活动的出现和发展”、“春秋战国时期的编辑出版活动”、“秦朝的出版活动”、“两汉出版的历史背景与整体特征”、“两汉时期的图书编校与出版活动”、“两汉时期编辑出版的图书”、“两汉时期的出版物形制与文字载体”、“先秦两汉时期的著名图书编撰(辑)家”、“先秦两汉的出版与社会”,并附录“先秦两汉出版大事记”。从全书可看出本卷的一些特点。

《先秦两汉卷》追本溯源,是一部全面探讨出版活动起源的重要著作。以“大出版观”的视野,借助史料考辨与分析,按照时间顺序,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社会历史框架下

阐述了萌芽之初的中国古代出版活动概貌。作者借助先秦两汉社会发展的脉络,理清了出版、编辑、图书的概念与起源问题,并在出版史与科技史、出版与社会等方面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,深化了以往研究的薄弱之处。

“史从考出”。《先秦两汉卷》首先界定了“出版”的概念,考证了中国出版活动的起源。“出版”一词属于舶来语,在中国出现于近代。以往古今中外对出版的各种定义,内涵不尽相同。由于对出版概念理解的不同,学界对中国出版的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都不尽一致。对中国出版起源时间的说法,即有先秦说、汉代说、隋唐说等几种。在考察这段历史的基础上,作者明确提出所谓“出版”应包括“编著作品、加工复制和广泛传播”三个要素,并且当具有“传播文化知识”和“积累文化知识”两个基本功能。作者进一步指出“原始的出版活动”和“现代出版活动”二者本质相同,虽然差异很大,是一种事物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。“以后几千年的文化史与出版史中,处处都有先秦两汉文化和出版因子的影子”。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社会、文化、民族形成期,在这一背景下,文化领域已经出现了具备上述要素和功能的出版活动。对于出版概念的界定,并把出版的起源定位在先秦两汉时期,使许多长期处于模糊、争论的相关问题明朗起来,也使作者后面的所有立论有了坚实的基础。

图书是出版活动的产物,与文字的发展

密切相关。《先秦两汉卷》提出“在夏这一历史时期,即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,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献典籍这一历史性的转变”。这种看法似乎是“有悖”于主流观点的,毕竟夏代几乎没有流传至今的文字、图书实物等证据。但这种建立在多角度考察基础上的推论也有一定的合理性。作者利用后代文献记载,结合史前、商代的考古资料、研究成果等比照分析,指出“甲骨文大都依次排列,串联成册,刻意收藏,从内容到形式都具备了书籍的必要特征,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字产生于夏代”,并作出夏代末年是我国原始文献产生的萌芽阶段”这一推论。由于夏代的文献典籍的存在与否尚未定论,因此这一论断的可靠性尚有待验证。该卷还论述了“最早的图书”的形制、文字载体、复制方式、装帧设计等方面的情况,使读者对它们有了直观、深入的了解。

编辑是出版活动的主体,是图书发展的需要。编辑概念的界定和起源的探讨,虽然普遍认为绝不迟至近代“编辑”一词的传入,但由于过去对出版、图书概念与起源的不确定,加之问题本身的复杂性,关于编辑的概念与起源的争论颇多,大致有商代起源说、战国起源说、秦汉起源说等。《先秦两汉卷》在理清前两者的基础上,经过对文字在夏末至商初发展的考察,提出“编辑活动起源于商朝。”商代末年,编辑这一职业已初具雏形,并出现了一些代表人物。他们通过编撰、复制、装饰、收藏图书等活动,积累了一定的编辑思想、方法等。《先秦两汉卷》专辟一章记载中国最早的著名的编撰(辑)家及其编辑活动,总结了他们原始的编辑意识与态度、编辑方法与标准,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编辑思想的传承性和规律性,阐述产生之初的编辑在出版史上的开创作用及深远影响。

对出版史上一些概念的定义和起源时间

的定位,是建立在科学的研究方法之上的。出版史是历史学的分支,《先秦两汉卷》遵循“论从史出”的原则,研究中注意搜集出版史料。先秦时期保留至今的史料匮乏,其中关于出版的史料更是稀少。对于直接可用资料少这种状况,作者查阅古籍、近现代研究成果,进行对比、辨析,去伪存真,保证了史料的正确性、可靠性,并作了有益的探讨,有力地支撑了学术观点的阐述。在这过程中,作者推陈出新,从传世与出土文献的论述中提出了新的观点。

从宏观上看,出版是社会大体系中的一个小体系,《先秦两汉卷》把出版史的研究放在当时社会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,拓宽了这一专门史研究的视野。出版是在社会中孕育萌芽,作者既分析了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科技等社会因素对出版的影响,也揭示了出版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反作用这一规律。例如在论述“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出版的萌芽”时,指出:“出版活动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发展,同时又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更大发展。”进而将出版对社会的作用概括为“教化、美刺、尚用、流传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五个方面”。再例如出版史的发展与科学技术史的发展联系紧密,息息相关。先秦两汉时期,随着生产力的发展,科技水平的提高,为出版活动者改进各项技术提供了物质条件,相关的技术革新又极大地反作用于出版活动。从中国出版活动产生之初的“镂于金石,书之竹帛”到纸张的广泛应用的过程,是一部书写载体的发展史,也是一部科技的发展史。

《先秦两汉卷》全面、系统、综合地反映中国出版起源研究的历史传统和最新成果。它运用新方法、新视角、新史料与传统研究一起形成了出版史研究的合力,追本溯源,解决了众说纷纭、争论颇多的关于中国出版史的源头及相关问题,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。